

论早期东亚华人社团形成的主要纽带

庄国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华人社团是维系早期华人社会存在的主要支柱。20世纪以前,华人社团的纠合因素,以地缘纽带最为重要,各类社团都有强烈的地缘色彩。神缘纽带和秘密会社是催生早期华人社团的重要因素。方言群是华人纠合的最宽泛的纽带。同方言的社群,通常意味着来自共同或邻近的家乡。神缘和宗亲组织,是在同乡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血缘和神缘纽带。

关键词: 华人; 社团; 东亚; 秘密会社

中图分类号: D634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0)03-0046-07

社团一向是华人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各种研究成果林林总总,不下数百种。¹然而,这些著作绝大多数研究20世纪以来的华人社团,对20世纪以前的早期华人社团关注较少,尤其缺少对早期华人社团形成原因的系统分析。本文以为,当代华人社团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仍可溯源自早期华人社团的形成背景。了解早期华人社团如何形成,有助于把握当代华人社团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本文的社团定义,指志愿结合的非营利性结社组织,其定义大概为“基于志愿且具有组织形式的私人团体,其团体成员的部分时间以不领薪方式从事团体的各种工作,参与并支持其团体追求共同利益。”^[1]本文的华人定义,指“中国本土之外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中国人血缘的个人或群体”。

一、地缘: 早期华人社团的主要纽带

早期华人移民,多为异域穷困之人,未得本国政权或当地社会保护,非互助无以自存。移民定

收稿日期: 2010-07-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华人移民现状、趋势和居住国政策》(10ARK002)

作者简介: 庄国土,男,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¹ 仅1990年代以来,以世界或国别的华人社团为研究对象,就有:李明欢《当地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方雄普《海外侨团寻踪》(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邱格屏《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三联书店,2003年)、George Hicks ed.,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1930s*, Singapore: Select Book, 1996)暨南大学石沧金博士的学位论文《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和厦门大学潘少红博士的未刊博士学位论文《泰国华人社团史研究》(2008)等。

居海外，再牵引家乡亲友相率出洋，相伴而居，呈“连锁移民”状态。定居久之，形成族人乡亲相伴聚居的状况。华人移民几乎都来自闽粤两省，闽粤多山，地区差异较大，十里不同调，百里不同音。早期来自中国各地移民为居住和谋生的方便，基于地缘、族源、神缘等因素，彼此结成团体，在异域守望相助，共谋生存和发展，社团遂以产生。社团之间的合纵连横，更大的华人帮派也因此形成。

华人社会分帮也是当地统治者的有意安排，是“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政策的后果。华人数量不多时，当地统治者将华人集中一地，与土著分开。1582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部沙禄（Gonzalo Ronquillo de Penabsa）颁令，在马尼拉城东北部与巴石河之间的荒地围以栅栏，令华人居住在内，置于西班牙人城堡的大炮控制之下，称为八连市场（Parian 明代史籍称之“涧内”）。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开埠巴城，招徕大量华商华工，限他们在城内集中居住一区，与荷人区域比邻。日本幕府限中国商船仅泊长崎，原分布北九州的唐人也只限住在长崎的专门地区，不得与日人混居。后又于长崎十善寺村御药园处，建造唐馆，名“唐人屋敷”。到长崎之华人，须聚此一地，出入及与外人交往，须通过当地官员和通事。^[2] 1650年，安南黎郑统治者忌华商增多，禁其在京城居住，仅允升龙东南部之清池（Thanh Tri）和劝良社（Khuyen Luong Xa）为华商居留之地。^[3] 1785年，英人赖特上校（Francis Light）开埠槟榔屿，即专辟华人区，引华商建屋定居。^[4] 华人移民数量增加后，则在华人区按籍贯适当分区。1819年，英国莱佛士爵士开埠新加坡，专辟华人居住区招徕华商华工。在他规划的华人社区中，按籍贯和阶层适当区分，特别照顾商人较多的厦门移民。^[5] 1814年，越南国王对华人实行按方言、籍贯分帮自治的管理制度。^[6] 这一制度也为后来的法国殖民政府所继承。当地统治者在华人聚居区设华人首领，管理本地各籍各帮华人，负责或协理华埠登记、征税、差役、治安、调解等事宜。侨领选自为当地统治者所信任之华人名流。在荷属、英属南洋及西班牙属菲律宾，侨领称为甲必丹，在越南、暹罗，称为帮长、社长、县长。

由于华人移民基本上呈同乡聚居状态，华人社会的基本分野并非按照其来自中国的省份，而是按方言群及相关地区。同方言的社群，通常意味着来自共同或邻近的家乡^[7]，相互间能方便沟通，而且相当程度上会从事相近的行业，在海外和在家乡有共同或相近的利益。因此，很多同业公会都有地缘背景，甚至以同乡会为背景组织同业公会。各地的中华总商会，通常会长、副会长由实力最强之地域社团首领充任。新加坡闽商实力最强，粤商次之，福建帮首领吴寿珍即为首任新加坡总商会会长^[8]，闽籍吴世奇为正总理，粤籍陈景仁为副总理。^[9]

方言群是华人纠合的最宽泛的纽带。到18世纪中期以后，华人社会大体已分为福建（闽南）、潮州、广府（广肇）、客家、海南等五大方言群（帮），各帮内再依地域（府、县、乡）或姓氏、宗族等结社。有些地方某个亚方言群的人较多，则自成一帮，如印尼、马来亚的福州帮、缅甸的云南帮和日本的三江帮，与其他方言群并立。^[10] 只有客家人情况稍有不同。海外客家人多数来自粤东嘉应州和毗邻的福建长汀府，少部分来自粤北、惠州、花县等地。海外客家人也按祖籍地纽带结社，但因来源地不同，彼此的内斗远较其他方言群激烈。如19世纪后期马来亚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拿律战争”、“雪兰莪战争”等，即是不同籍贯的客家秘密会社之间，为控制锡矿开采权而发生的大规模武力冲突。^[11]

以方言为纽带的各帮，通常由数以百计的各类社团组成。早期社团以同乡会为主，次之则是宗亲会和神缘会。宗亲会和神缘会的成员通常也来自同方言的地域，只是在同乡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强调血缘和神缘纽带。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加和华埠社会的扩大，华人纠合为社团的纽带种类也显著增加。除地缘、血缘和神缘纽带外，行业、慈善、宗教、文教等各类社团次第产生。到19世纪末以后，目标为中国或当地政治事务的政治性社团也开始出现。但无论这些社团的宗旨有多大差别，仍显示出明显的地缘色彩。

二、神缘: 催生早期华人社团的重要因素

神缘为早期华人纠合结社的最重要催化剂。早期华社为祭奉家乡神祇或开埠先贤而建的庙宇,是当地华人聚会交流的主要会所,很多庙宇成为秘密会党之源。17世纪前期,泉州和漳州人已在长崎建福济寺,三江人建兴福寺,福州人建崇福寺。1678年,广府人建圣福寺。^[12]这4个佛教福寺中亦设妈祖堂、关帝殿,奉祀出洋华人的传统神祉。各帮商民分聚四福寺,行守望相助之责。由此可见,以神缘为纽带的华人结社,仍基本上以地缘为基础。东南亚也是如此。马六甲青云亭为新马华人最早所建著名庙宇,1673年始建,曾为槟城甲必丹之衙署,是槟城闽侨的主要聚会场所,后兼办义学、恤贫、丧葬、处理纠纷等事宜,已初步具有社团功能。至1906年,先后经过6次扩建和重修。^[13]1695年,暹罗华人即建有闽南人祭奉之清水祖师庙宇。^[14]18世纪前期,闽南人供奉之本头公庙也出现于阿侖陀耶。^[15]1799年,槟城的惠州、嘉应、大埔、永定和增城客属共建海珠屿大伯公庙,祭奉南来槟城之客属先贤张、丘、马三公。^[16]大伯公庙为槟城秘密会党大伯公会之嚆矢。次年,甲必丹胡志明倡建槟城广福宫,祭祀观音,也称观音亭,并陪祀闽南粤东所崇多位神祇,为槟城漳泉和嘉应籍商民所奉。^[17]1773年,缅甸阿摩罗补罗的云南人在汉人街旁建观音寺,花费150000铢,由当地华商从输入货物税款中抽成捐建^[18],为滇商之共聚议事之所。

各类宫庙多为方言群所建,代表帮权势力,其主持人亦为帮首,为后来之社团的雏型和前身。早期会馆亦多首设于宫庙。即使在19世纪末会馆成为华社主要组织后,宫庙仍为各帮派凝聚本籍会众之宗教和习俗活动中心。尤其是华人所重视之丧葬,仍为宫庙的重要职责。在海峡殖民地,各帮均有宫庙理义冢事宜,如新加坡福建帮之恒山亭,广府帮之碧山亭^{[19][20]},客家帮之绿野亭^[21],潮州帮之泰山亭。自青云亭始建至清末,英属马来亚之宫庙如雨后春笋,林林总总不下数百个。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强力推行天主教,菲律宾华人不得兴建源自家乡的庙宇或宗祠作为聚会场所,故菲律宾华人神缘、地域社团与文教诸事业的发展,远迟于南洋其他地区。但据称早在1720年,马尼拉已有华侨米商同业工会。19世纪初的马尼拉税收记录中,记有华人马车运输的同业公会^[22],但均未延续。民国存续之同业公会,多只能追溯至19世纪末。同业公会之外较早的华人社团,为喜好南音者组织的“菲律宾金兰郎君社”和“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总社”,成立于19世纪初。¹荷属东印度的情况与西属菲律宾大致相同。荷人殖民吧城之初,严禁居民信奉基督教之外的宗教,特别强调取缔华人和摩尔人的各种宗教和神祇崇拜。^[23]荷印华侨不得奉祀家乡神祇,地缘或宗亲社团亦难产生。冀图有所托庇的华人,只好加入秘密会社。19世纪前期,仅有泗水惠潮嘉会馆(创于1820年)等少数同乡会馆存在。

新马华人最为集中,华人宫庙较多,华人社团也较早成立。18世纪末,客属槟城嘉应会馆和广东暨汀州会馆成立,或为马来亚最早之地域性社团。1805年,槟城中山会馆、马六甲惠州会馆、马六甲茶阳会馆等相继成立。此后数十年,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土邦辖地的广肇籍和客家籍会馆纷纷成立,不下数十家。马六甲潮州会馆之前身“潮州公司”出现于1822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之前身天福宫成立于1839年。马六甲天福宫成立则迟至1823年。^[24]海峡殖民地之早期华人社团,以人数较少的广肇籍华侨成立最早最多,次为客属社团,人数最多的闽南籍华侨社团数量较少,成立亦迟。盖因闽籍华侨经济势力雄厚,甲必丹多由其担任,与殖民政府关系较密切,且各秘密会社中闽南籍者实力较大,故不似广肇、客家籍华侨,虽已入会党,尚期待组成地域社团互助。

¹ . 晋江县侨务办公室编:《晋江县旅外社团组织》,1987年,晋江印刷,内部流通本。本人在2008年考察马尼拉郎君社,似无证明成立之确切年份,但大体可认定在嘉庆末年。

三、秘密会社: 早期华人社团的主要形式

19世纪中后期东南亚秘密华社的兴盛,与秘密华社介入华工贩运和东南亚华工数量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各华社的领导层,多不同程度与秘密华社有瓜葛,一些华社要角,本身就是会党魁首。如新加坡之梁亚保与麦钧,槟榔屿之邱天德,均为显赫一时之会党首脑兼客头。尤其是能接纳大量新移民的各大华人种植园和矿场,其园主和矿主大多身兼会党首脑和苦力掮客。因此,早期华人社团大多为秘密会社,以海峡殖民地最盛。

东南亚秘密会社源于中国天地会。其入会须行歃血为盟仪式,誓词亦大体与天地会同。^[25] 早期成员多来自中国天地会。1786年,台湾林爽文率天地会众起义,被镇压后,余部多遁往东南亚,蔓延于安南、暹罗、缅甸、婆罗洲、苏门达腊和爪哇。

荷印当局向来严防非当局监督下的华人组织的存在,并于1846年宣布私会党为非法组织。1868年,荷印政府在苏门答腊巴东(Padong)搜出天地会文件^[26],防范秘密会社措施更加周密。故华人会党活动极为隐蔽,公开社团组织亦甚少建立。

1794年,槟城总督赖特首次提及槟榔屿华人善于秘密结社,以反抗政府之不合意法律。1799年,槟榔屿华人会党因公开反抗殖民政府被镇压,头目遭审判。19世纪中期至后期,东南亚华人秘密华社组织兴盛一时,源于中国大批有会党背景的新移民南来。据说在1841年,新加坡的天地会会员已有万人。1851年,新加坡华人人口27 988人,天地会成员达两万多名,占华人总数的70%以上。^[27] 尚有会党成员从香港和荷属东印度至廖内、巴东,潜入海峡殖民地。1853年,天地会分支闽南小刀会举事,失败后大规模逃亡东南亚,或谓达两万多人,大部分加入海峡殖民地之义福会。^[28] 故至1860年,新加坡警察局估计,私会党人数约4万。^[29] 太平天国失败后,其两广余部亦不少人遁亡南洋。沙捞越石隆门矿山华工几乎尽为天地会会员。^[30]

19世纪中期,英属马来亚地区之华人会党,林林总总数十个。最大者为义兴会和海山会。其他各会,大体或依附、或分离、或居间连横于两大党间。会党之分野,仍是以地域为主要标志。19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义兴会即衍生出广府帮的义兴会、福建帮的义兴会、潮州帮的义兴会、客家帮的义兴会和海南帮的义兴会等5个分支。^[31] 1867年,仅槟城义兴会会员约25 000-26 000人,占槟城总人口的20%。其中,14 000-15 000名会员在威省。海山会员约5 000-6 000人。尚有各自依附于华人会党的土著会党红旗党和白旗党约4 000人。^[32] 随着华人涌入各马来土邦,华人会党势力随之扩张至半岛内地。尤其在华人集中的锡矿区,几乎无人不是会党成员,尤以义兴会和海山会势力最盛。矿主多为会党头领,矿丁亦为同会帮众。1876年,仅在新加坡和槟榔屿两地登记之会党有72个。^[33] 海峡殖民地和各马来土邦的华人,60%以上是会党的成员,余40%也都处在会党的影响之下。^[34] 会党大小头领多为商人或技匠,以商人最多。1881-1889年间,新加坡21名会党头领中,商人有9人。1889年,槟城40名会党头领中,24人是商人。^[35] 大头领则多为华社闻人,或富商大贾,或大矿主、或专营饷码承包者、或为甲必丹,或身兼数种闻人身份。霹雳海山会首领郑景贵,槟榔屿义兴会的首领陈亚炎等,既是大锡矿主,又拥有许多产业,富甲一方。^[36] 柔佛的港主,几乎都为义兴会首领。雪兰莪海山会首领叶亚来,兼矿主、商人、包税人和甲必丹为一身,甚至行使英人赋予之地方司法权。^[37]

暹罗早期华侨社团多为与庙宇相关之秘密会社。或谓1809年,普吉岛已有华人洪门会党,与槟城洪门过往密切。^[38]^[39] 次年,槟城义兴会有来自暹南华人之捐款。^[40] 1824年,暹罗洪门会党之活动已为政府报告所记载。^[41] 1848年,北柳城大兄帮会组织暴动,首领为潮州人辛通。仅潮人吴武即动员了甘蔗园华工及数家糖厂业主共1 200人,加入大兄帮。^[42] 19世纪80年代初,在暹南的

攀牙府德古巴城，仅义兴会就有会员 3 200 多名，公恩会有 800 多名，较晚建立的和生会势力较小，但也拥有会员 300 多名。^[43]至 1902 年，暹罗华人几乎均分别属于各个秘密会社。^[44]潮州人、闽南人、海南人之会党称“义兴”，广府人之会党称“粤东”、“八角”，客家人之组织称“明顺”、“群英”。^[45]其下因姓氏、宗族、村乡之别，再分为小会社。华工聚居地尤多会党。1892—1901 年间，暹罗铁路之华工多为会党成员。不同会党间常为招工、工价、商贸地盘等而火拼。1889 年，曼谷华人会党为争夺向曼谷 3 家最大米厂提供苦力之垄断权而开战，甚至使用枪械。暹罗政府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约 900 名会党成员被审判。^[46]

1890 年初，海峡殖民政府拟订《危险社团镇压法令》，取缔所有秘密会社，销毁其文件、会旗、名册和神主牌。若成立社团，须合法注册。同时，殖民政府成立华民参议局 (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将大多会党首领罗致入局，由华民护卫司任主席，海峡殖民地的主要会党均被宣布为非法。^[47]秘密会社就此衰落，合法社团取而代之。华社各种地缘、血缘、业缘社团纷纷成立，以闽籍社团最多。

以地缘、血缘或神缘为纽带的华人社团，虽有守望相助、联络情感、聚合同乡同族之功能，但大小社团分帮结派，却也是华人社会畛域分明、彼此内斗不已的始作俑者。

四、中华民族主义：华人社团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19 世纪末以后，中华民族主义热潮在海外华人社会兴盛未艾。¹ 以中国国内目标为诉求的华人社团不断出现，且俨然成为华人社团主流。各帮各派之社团，几乎都不同程度卷入此热潮。20 世纪初，中华总商会的成立是华人社团史上的里程碑，较大地改变了华人社团之间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在清朝政府的推动下，东亚各地华人社会陆续成立超地域、帮派、血缘的社团组织——中华总商会。1903 年，槟榔屿中华总商会率先成立。此后，新加坡、吉隆坡、霹雳、彭亨、日本各埠的中华总商会相继成立。各类较大的社团首领，几乎均在商会的董事会占一席之地，会长、副会长通常由实力最强之地域社团首领充任。故商会主导华社事务，其影响力不下于以前之秘密会社。根据 1903 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海外各埠中华总商会的建立，需向清朝商部备案、核査，接受商部的章程和指导，而且总理、协理由会董公推，再由商部批准任命，接受清朝颁发的官防。各地中华总商会隐然凌驾于各种方言、地域、血缘的社团之上，协调各帮派利益，代表华人社会与当地政府、清政府打交道。

海外华埠的中华民族主义大潮，还催生了直接以中国政治事务为宗旨的华人社团。189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但仅有分会 6 处，会务不彰。其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在海外华埠成立保皇会。保皇维新论在华埠风靡一时，各埠保皇会数以百计，成员数十万。如康有为所言，“凡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岂吾所及料哉！”^[48] 1905 年，孙中山等兴中会成员联合流亡日本的光复会及华兴会要角，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其分部组织相继在东亚各埠建立。数年间，迅速取代保皇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至 1911 年，凡东南亚华人所到之处，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

民国期间，华人的中华民族主义热情更为高涨，华人社团数量随之剧增。虽然华人社团的宗旨更多元，组织形态也逐渐现代化，但地缘、宗亲和神缘纽带，仍然是维系社团凝聚力的主要因素。

¹ 关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华人社会民族主义兴起的研究，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教出版社，2001 年，189-220 页。

结束语

华人社团是维系早期华人社会存在的主要支柱。华人多分属不同社团,华校大多为社团创办,华文报刊通常也有社团背景。20世纪以前,华人社团的最主要基础,是来自共同或相邻的祖籍地,方言社群是华人社会最大的派系,各类社团都有强烈的地缘色彩。从故乡引入的宫庙神祇,催生早期的华人社团。源自中国的秘密华社,是早期华人社团的最重要形式。虽然在新移民剧增和中华民族主义热潮影响下,华人社团的种类和数量快速增长,但守望相助,共谋发展,仍是社团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注释:

- [1] R. T. Anders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the Fede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67, Vol 37, pp 175-176
- [2] 金安清:《东倭考》,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上海书店影印本,1982年,第208页。
- [3] Fujiwara Riichiro, "The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under the Trinh Regime and PhoHien", in *PhoHien: The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the XVIIth ~ XVIIIth Centuries*, comp. Association of Vietnamese Historians,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1994, p. 97.
- [4] [马] 黄尧:《星马华人志》,香港:明鉴出版社,1967年,第46页。
- [5] 约翰·非普斯:《关于中国和东方贸易的实习论文》第251-283页,载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66-69页。
- [6]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越南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8年,第35页。
- [7] [11][25][30][32][47] Leon Camber,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New York: J. J. Augustin, Locust Valley, 1959, pp 21, p 126, 126, 118, 26, 118, 265-266
- [8] [新]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年,第318页。
- [9] 《商部奏为新加坡设立中华商务总会请予立案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外务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322-323页。
- [10] 谢美华:《广府籍华侨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兼论晚清南洋华侨帮派对国内政治的态度》,《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 [12] 罗晃潮:《日本华侨史》,广州: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136-137页。
- [13] [新] 林孝胜:《创建初期的青云亭》,《星洲日报》1979年5月21日。
- [14] [德] 傅吾康主编, [泰] 刘丽芳合编:《泰国华文铭刻汇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第605-607页。
- [15] [泰] 旺威帕·武律叻达纳攀与素攀·占塔瓦匿:《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初期泰国社会中的潮州人》,汕头市政协主编:《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61-62页。
- [16] 《海珠屿大伯公庙重修碑记》,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24页。
- [17] 《重修广福宫碑记》,陈铁凡、傅吾康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532页。
- [18] Henry Yule, *A narrative of the mission sent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 of Ava in 1855*, reprinted Kuala Lumpur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43-144
- [19] 张夏炜:《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41-44页;
- [20] 《1890年碧山亭碑文》,陈荆和、陈育崧合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21-261页。
- [21] 《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特刊》,新加坡福德祠,1963年,第1页。
- [22]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02, 110
- [23] W·J·凯特:《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王云翔、蔡寿康等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 [24]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 323-355页。
- [26] 施莱格:《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4页。
- [27]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157
- [28][29][37] Wilfred Blayhe, *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 A History Stud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09, 538, 193
- [31] T. P. Wang “Chinese Towkay and Worker Strik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57-1900)”,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Nanyang Quarterly*, Vol XI 1981 p 9
- [33] 可儿弘明:《从新大陆转向东南亚的“猪花”》,《南洋资料译丛》1984年第 3期。
- [34]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48
- [35] 颜清滢:《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李恩涵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第 42-43页。
- [36]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第 113页。
- [38] 张映秋:《泰国华人社团模式的演变》,《东南亚研究学刊》1994年第 11期。
- [39] 冷东:《东南亚海外潮人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 308页。
- [40] Ma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ies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2
- [41][45] Saras in Viraphol,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21, 221
- [42] 泰国国家档案馆:《华人吴武就北柳城洪门帮派组织猖獗的供词》,转引自旺威帕·武律叻达纳攀·素攀·占塔瓦匿:《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初期泰国社会中的潮州人》,汕头市政协主编:《红头船的故乡——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 82页。
- [43][泰] 素帕拉·乐帕尼差拉功:《1824~1910年泰国洪字秘密会社》,杜建军译,《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4年第 6期,第 148, 149页。
- [44] James M cCarthy,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in Siam*, London: John Murray, 1902, p 3, 转引自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40
- [46]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40
- [48][美]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第 449页。

[责任编辑:乔云]

A Study on Factors of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East Asia before 20th Century

ZHUANG Guo-tu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s had been the main pillar for the sur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although clan, worship, religion, business, Chinese education, public welfare and even the political purpose could be used for the cohesion to establish an organization, the common hometown in China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cohesion for the united overseas Chinese. Even the difference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was also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hometown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organization, East Asia, Secret society